

一个南京人眼里的西湖

——南京与杭州

叶兆言

作为一名南京人，说起杭州的西湖，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酸溜溜。南京属吴，杭州属越，吴越春秋吴越争霸，自古好争好斗，早就结下梁子。争过来斗过去，好像一直是浙江人占便宜，越人总是胜利的一方。当然，最早的吴越之争，与南京和杭州也没多大关系，那是苏州人和绍兴人在打架。

因为要写南京传，写到了南唐，写到了南唐的灭亡，才意识到南京人对杭州人的怨恨，真要说起清算，其实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隋唐之前，杭州还不是浙江境内的老大，就像在三国前，南京不是江苏境内的首席一样。到五代十国期间，两个城市都已经羽翼丰满，都开始牛了，都像模像样地成为当时一个国家的首都和京城。

南京是南唐的首都，杭州是吴越国的京城，虽然只是十国中的小国，都有些小富裕，都不是北方的对手，都害怕北方。南唐略为强一些，吴越国稍稍弱一些，陆游的《唐书》上记载：

吴越国大火，焚其官室，弩藏兵甲几尽。将帅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听。遣使厚持金币啗之。

有人劝南唐李煜的爷爷李昇，应该说借助这场大火，趁机出兵，灭掉吴越国。结果烈祖李昇宅心仁厚，不仅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还“厚持金币啗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捐了一大笔款子给受灾的邻国。当时南唐和吴越国边界，在常州一带，这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一条国境线。两国当然时有

摩擦，总的来说，还算相安无事。问题出在宋朝开始出兵攻打南唐，吴越国也趁火打劫，同时出兵，结果真把南唐给灭了，李煜也就成了李后主。

亡国就亡国吧，南京人耿耿于怀，人家宋军纪律还严明，作为帮凶的吴越国却很不像话，烧杀掳掠。这件事，史上上白纸黑字，记载得清清楚楚。

吴越国的背信弃义，也没什么好结果，南唐灭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吴越国很快也跟着灭亡。远亲不如近邻，唇亡则齿寒，兔死而狐悲，这些古话当然是有道理。因为都是受害者，都亡了国，以后又都是大宋老百姓，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所谓耿耿于怀，也是说说而已，掉掉书袋，如果不翻书，很多人恐怕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南京人真正的不痛快，还是那个西湖。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说起南京和杭州，必定要拿玄武湖和西湖来说事。而西湖总是略胜一筹。喜欢热闹的，肯定会说西湖好，南京人就常发感慨，说你们看看人家西湖，人山人海，车水马龙，那种繁华景象，那种热闹，再看看玄武湖，空旷得都可以遛马。不喜欢热闹的，当然喜欢空旷，空旷产生寂静，寂静正好可以用来怀古，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不怀古，还有什么意思。

西湖曾经也是十分寂静的，写西湖的牛人张岱有两篇牛文，一篇是《西湖七月半》，一篇是《湖心亭看雪》。喜欢读点古文的人，一定会熟悉这两篇文章。《西湖七月半》开头便

很突兀，“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是中元节，俗称“鬼节”，南京人读到这样的开头，忍不住会心一笑，张陶庵真不是个东西。

《湖心亭看雪》短小精悍，主题与《西湖七月半》近似，都是清高，都是孤傲，名士气十足，没有人间烟火。结尾一段，南京人读来，心中特别得意：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岱是绍兴人，长居杭州，对西湖怎一个爱字了得，要不然，他也写不出《西湖梦寻》。喜欢晚唐诗和晚明小品，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行文至此，忽然开始穿越，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几百年前两位金陵人之一，能够有缘与张岱这样的高人浮一大白，太好了。

若要论及时代，与张岱所处的明末相比，我更喜欢宋朝，更喜欢北宋。而说起西湖，首先想到的是苏堤，想到苏东坡。苏东坡不止是文章写得好，诗写得棒，词填得漂亮，光一个苏堤，已足以扬名千古。一项好措施，一个好方案，能够造福千年。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基本思路，也不复杂，就是疏浚，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宽广的水面还在，

于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各种各样的美好都有了。

同时期的王安石，在这方面，远没有苏东坡的远见卓识。当年的玄武湖与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与长江直接联在一起，今天无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辽阔。六朝时期，帝王在这检阅水军，桅樯林立旌旗蔽日，楼舰五百雄兵十万，鼓角声震天动地。王安石则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行事实果敢，是治国的能臣，几次位居宰相，然而，有时候如果只看到眼前，过于现实，就有可能犯很严重很致命的错误。王安石泄湖得田，玄武湖因此损失二百多年，经过后来元朝的两次疏浚，玄武湖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图上出现，湖水面积当然就有点惨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说不上。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一番，如果废西湖为田，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东坡治理西湖，王安石治理玄武湖，两个方案两种结果，一个是堵一个是疏，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立刻就能想明白。因此，还是文章开头的那个意思，吴越相争，譬如简单的治水，杭州又一次赢了，赢得很光彩。

笔会

首席编辑专版

不时有读者来打听：什么时候再有“双城记”？或者说：我的家乡非常好，什么时候可以轮到它？

这种充满参与热诚的期待，对编辑来说，大概属于最愉快的工作压力了。

来了，来了！今天的专版又是“双城记”。

这回被写到的城市是这三组：南京和杭州，潮州和广州，大阪和东京，都是很有特点和风格的地方；三位作家对它们的描写更是将城市发展史和个人心灵史交织在了一起，非常值得细读。

——编者

年礼，提醒自己已经永远离开父母的羽翼，潮州则是一个逐渐远去的故乡。

广州的一切，对小镇青年来说是大开眼界、目不暇接的新鲜。

从车站到学校，会经过当年羊城八景之一的区庄立交。要知道潮州连行人天桥都没有，而广州的第一座立交桥区庄立交可是有多达四层互不干扰的路面啊。看着前后左右上飞下穿的车流，恍然有心灵遨游未来的即视感。

作为一个外来人，广州最让我迷恋的地方是它的自由、包容和契约精神。

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但广州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从这里北上。黄埔军校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在广州。今天的先烈路上，还可以看到纪念淞沪抗战中英勇捐躯的十九路军将士的凯旋门，上面写着“碧血丹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中，是高高耸立的自由女神像，纪念那些为了理想、为了民族的未来不惧牺牲、浩气长存的林觉民们。

广州从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就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到唐代，聚集在广州的外商已经有十多万人。从此，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并从未关闭过的贸易通商口岸，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更同时是中西文化宗教的交流重地，各国高僧、传教士陆续经由广州来到中国。至明代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时，广州也是向大部分国家开放的唯一通商港口。清朝乾隆年间，广州更成为“一口通商”的那一口，广州十三行垄断了大部分中国的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及伦敦。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通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商品交易会，自然也设在广州。

港口城市的气质就是包容，广迎天下客，来的都是客。而成为商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契约精神。

在广州待了三十年。虽明知去北京、上海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发展，但我没有离开，而是用三十年的时光把广州住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大抵上，日本通常被视为是个均质化的国家：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令人们容易忽视这个国家的地方个性，而发达的交通所带来的流通便利，也让这个国家的城市气质相近。甚至城乡之间，也几乎只剩下人口密度这一条差距了。

因此，当我十多年前初到日本，看到一个比较大阪人和东京人不同的电视节目时，实在是大吃一惊。

那是一个进行街头实地调查的综艺节目。其中有两个镜头是这样的：

主持人手执一把玩具枪，首先站在东京街头朝着往来行人做扫射状，嘴里模仿着机关枪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

东京人脚步匆匆，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主持人被面无表情的东京人直接无视了。

接下来镜头切换：手玩玩具枪的主持人，这次站到了大阪街头。嘴里模仿着机关枪的声音，朝着街头来来往往的大阪人又是一通“哒哒哒哒”的“扫射”，很快，有好几位正好路过的大阪人十分配合地手捂被“射中”的胸膛，做出临死前的挣扎状……

原来，大阪人和东京人如此不同呢。东京人的性格里有着略带无机质的严谨，而大阪人则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即使街头一位路人甲，也能即兴配合电视台的节目表演。原来所谓日本人的均质化，不过是物质均值所带来的表象，而内核里，日本各地不同城市是有不同性情的。

例如东京与大阪，这一东一西两个城市，虽然都属于日本，都说着日语，但却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大阪出生的小说家、直木奖得主藤本义一就曾说过：“我一直使用大阪国籍活着的人。怎么着也无法说自己是日本国籍。”

这或许基于大阪的历史渊源。

大阪最早在日本历史上登场，是公元六世纪圣德太子在大阪的上町台地建造四天王寺的时候。当时四天王寺作为日本第一号官寺，负责接待前往奈良访问的中国来使。此后，在公元八世纪后半叶，上町台地因天皇迁宫一度变成了难波京。不过难波京在日本历史上的时间极短。但因为源自奈良的大和川、以及源自琵琶湖的淀川都流入大阪湾，因此大阪作为河口港开始得到逐步发展。到日本战国时代的1496年，净土真宗本愿寺八世莲如上人，看中了上町台地的极佳地势，搭建了被称为“石山御坊”的草坊。这个“石山御坊”，就是后来著名的“石山本愿寺”——石山本愿寺所在的周围全部是湿地和水域，唯一的高台就是寺院所在的上町台地。净土真宗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净土真宗的信徒与商人开始从四周云集，不久便以本愿寺为中心形成“寺内町”，最后演变成一个人口超过二万的城寨型都市，空前繁荣起来。

当时织田信长正雄心勃勃地想要统一日本，当然不会放过上町台地这个交通要塞。于是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的“石山合战”：一方是屡战屡胜的信长军，一方是负隅顽抗的本愿寺僧侣兵。石山合战是骁勇善战的织田信长短暂的一生中，打得最长最艰难的战争——整整十一年织田信长都没能将上町台地这个地方攻克下来，最后不得不与石山本愿寺的僧侣们握手言和。

石山本愿寺最后毁于一场大火。而继续织田信长之后看中上町台地优越地势的人，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石山本愿寺的遗址地大兴土木，建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大阪城。大阪因为丰臣秀吉而成为“天下厨房”——直到江户时代，大阪都是日本全国食粮与物产的集结地，是日本最繁荣发达的商业都市。当时江户人将京都大阪恭敬地称为“上方”：因为天皇居住在京都，而大阪则掌握着日本全国的经济流通命脉，不仅向江户输送物产，还向江户输送最时尚的生活理念。

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1590年，当时独揽大权的丰臣秀吉，突然下令德川家康转封至江户——这道命令让丰臣秀吉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德川家康花费了七年人力物力，眼看即将竣工的甲府城名正言顺地占为己有。德川家康的家臣们为此一个个都愤怒得想要拔刀造反。因为当时的甲府是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地，而江户则只是一片令人绝望的不毛之地：延绵无尽的湿地，一遇大雨就河川泛滥连日内涝，环境之恶劣，令人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恐怕是德川家康一生中中最屈辱的一件事。但擅长隐忍的德川家康制止了想要造反的家臣，二话没说就将甲府交给了丰臣秀吉，带领家臣前往江户而去。

到达江户之后，德川家康开始每天外出打猎。一直到十年后的“关原之战”爆发，德川家康都在打猎——德川家康以打猎为名，走遍关东大地，将江户以及关东平原的地形彻底勘测了个遍。得出的结果令德川家康

大阪东京大不同

唐辛子

内心狂喜：这片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关东大地，原来隐藏着巨大的宝藏。谁掌握了这个宝藏，谁就能掌握整个日本列岛。不动声色的德川家康，在心里发誓要好好建设江户，超过丰臣秀吉的大阪城。

开启关东大地宝藏的钥匙，是利根川。只要能战胜这个强敌，就可以改写日本历史。1603年江户幕府开府之后，德川家康和他的儿孙们，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最持久的“土建工程”：德川家康制定了“建筑劳役”制度，利用各地大名的人力财力，分步骤地实施一系列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从1604年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开始，一直到1654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德川家族花费了整整50年时间，开拓河床、疏通水路，终于将关东平原从毫无希望的湿地，改造成为可以种植的新农区。江户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江户初期，因为关东大地的贫瘠落后，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大阪所在的东日本，都要向京都大阪所在的西日本寻求血液，但随着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初见成效，江户文明逐渐开花，日本的文化中心点开始逐渐东移，到江户后期，江户文化与上方文化已经并驾齐驱。接下来明治维新，江户无血开城，改名“东京”，一跃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

德川家康最终实现了他的誓言，他游荡在江户上空的灵魂，恐怕要欣慰地笑出声。或许这个世界真有灵魂，因为时至今日，江户即使已经变身东京，但德川家康赋予这座城市的灵魂却从不曾改变：东京这座城市灵魂，是德川家康式的，是武家的。而“隐忍力”则是聚集其精气神的核心力量。德川家康不仅以超越常人的隐忍力开拓了江户，也要求他手下的武士们，以强大的隐忍力来维持江户的统治。那些备受赞颂的武士美德：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等，无一不源于武士们抹杀自我个性的隐忍。这种武家的隐忍力，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东京人夹队欢迎麦克阿瑟。之后，它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动力，化作日企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但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历史悠久的大阪，大阪商人的终极追求是“利”。而逐利的手段讲究灵活变通。这与武家美学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武士道只能是属于武士的，大阪人是商人，商人不需要“武士道”，因为商人有自己的“商人道”。何谓“商人道”？除了买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诚信，买者受益、卖者获利，制造者既受益亦获利——这种“三者皆赢”的模式，才是“商人道”的大前提。“商人道”的大阪人讲究和气生财，习惯对人笑脸相迎，投其所好。因此，当东京人面对电视台的玩具枪冷漠走过时，大阪人会极其配合地“中弹”倒地。

所以，当海外的许多人将日本人统统贴上统一标签时，大阪出生的作家藤本义一会说“大阪人不是日本人。大阪没有武士道”。另一位大阪出生的大名人、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也公然主张“大阪人是懂日语的华侨”。“阪侨”一词源自“华侨”——尤其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侨，这些自唐末以来，开始陆续迁移到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勤劳节俭、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常常能白手起家创下莫大财富。因此，大宅壮一觉得商人气质的大阪人和这样的华侨非常像，是“华侨”的缩小版，应该称为“阪侨”——也即居住在日本的大阪侨民。

大宅壮一是流行语的创意名人。他最有名的一句流行语，是骂日本人“一亿总白痴化”。当然，这“一亿总白痴”里应该不包括大阪人。因为大阪人是“阪侨”嘛。



江南丝市（局部，国画）李子侯

外来人的成年礼

——从潮州到广州

李 戎

我小时候的潮州，是个很小的县城。城里只有一条主要的街，纵贯南北，我们都管它叫大街。这种命名法倒是很美国：美国好多城市都有一条叫Main Street的主街。这样想想，家乡马上洋气起来。

我家住在古城的北门，离李嘉诚旧居直线距离不到200米。他家门口的北门街，就是我们家买菜的菜市场。

小时候经常要跟外婆去走亲戚。每次都是去她的妯娌在南门外猷巷的家，抽根烟，聊聊天，全是小孩觉得特别无聊的行为。从北门走到南门，大概有一千两百米远。这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有如长征一样的距离，每次都是走到腿快要断的感觉。这样断腿的行程，每个月一般有两次。

等我很大以后，才知道，我和外婆走那么远，是去借钱的。我的父母在各自的家里都是长子长女，上有老下有小，还各有弟妹，每月的工资都是入不敷出，每到月底就得去亲戚家借钱周转。外婆是前清末代秀才的儿媳，每次去，都会委婉地说，“哎呀，今天怎么搞的，出门忘了带钱了，先借5块钱去买菜。”她的妯娌无比默契，绝不多问半句：为什么每次出门都会忘带钱。就这样月底借，月初还，循环往复，传统的民间无息小贷金融满足了我们一家的现金流需要。

我在潮州出生长大的那些年，潮州的地位很低，被汕头管辖着。我的同学到外面上大学被人问起籍贯，还要怯生生地说，“我是汕头潮州人”，生怕出生地名头太小。但其实，潮州祖上是很阔的。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时，潮州就是其中约定的对英法美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由于潮州城区三万民众的强烈反抗，外国人主动放弃在潮州城区贸易，改到相对安全的汕头设立海关，进行贸易。在此前，汕头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就像改革开放前的宝安一样。但此后，汕头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安全的环境，逐渐超越了潮州城区，成为粤东的经济中心。1981年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自此一骑绝尘，把潮州留在了岁月里。1940年逃难离开潮州的李嘉诚先生，也把他要捐给家乡的大学放到了汕头。

潮州有个叫“时钟楼”的建筑，其实是个教堂。这个叫圣母进教之佑大堂的建筑是天主教在潮州的哥特式教堂，历时19年打造，建成于1904年，当时的规模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圣心大教堂。

1904年的潮州还有另一件盛事：当年的8月19日，通往汕头的潮汕铁路开工建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商办铁路，1906年11月16日建成通车。这条全长42公里的铁路花了200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工程由日本工程师佐藤兼之辅主持，枕木和车厢来自日本，钢轨和火车头则是美国制造。饶宗颐的《潮州志·交通志》记载：“因潮汕铁路控制福建西南及广东东部出海要冲，营业额甚为可观，日均货运量约为100吨以上，收入几乎可以和日本东海道的铁路相等，是当时中国营业状况最好的铁路之一。1939年潮汕战役爆发，6月16日因潮汕铁路遭受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破坏，被当时广东省保安处和第四战区汕头前敌指挥

部下令拆毁。抗战胜利后，潮汕铁路公司无力再兴建恢复铁路，于是在原铁路路基的基础上将铁路开辟为公路，即为现在的潮汕路。”

这条已经不复存在的潮汕铁路和我外婆是同龄人。同样生于1906年的外婆一生受尽磨难，但对儿孙只有慈爱。她身上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切美德，一直隐忍，从未听她抱怨半句。她和我还是中学的校友，到我上大学时，她还跟我通信，尽管因为眼花，字写得斗大，每页信纸上只能写七八行字。我很自豪，因为同学里面，虽然也都会收到家书，但没有人会收到外婆的亲笔信。

我和外婆上的中学，是潮州当地有名的学校，前身是创办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金山书院，因古籍藏书丰富成为当时名人学者的聚集地。后来教易其名，从潮州中学堂，到省立潮州中学、省立潮州金山中学，再变为广东省立第四中学、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潮安县立第一中学，现在叫潮州金山中学。

80年代的金山中学在全省都有竞争力，进了金中，上大学就相对有把握了。

1987年，我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到广州念书。就像江浙子弟都要往上海聚集一样，粤东粤西粤北的年轻人，到省城去发展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那一年九月的一个清晨，坐了一个通宵大巴的少年人睡眼蒙眈地在广州小北下车，到达了他人生中最重要